

学术江湖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桑兵 著

学术江湖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桑兵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 桑兵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598-0042-8

I. ①学… II. ①桑…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后期—文集②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民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089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张旖旎 罗丹妮

装帧设计：彭振威

内文制作：陈基胜 龚碧函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1270mm×960mm 1/16

印张：24.25 字数：330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6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005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 一 圣道与技艺 /032
- 二 分途未必并重 /038
- 三 西体双轨 /044
- 四 分途与合流 /050

“中国哲学”探源

- 一 “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 /058
- 二 泰西哲学与中学 /068
- 三 “中国哲学”的取向 /076

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 一 废除汉字：近代汉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 /088
- 二 我手写我口：白话文的过渡使命 /096

三 文言白话 孰为正宗 /104

四 龙种? 跳蚤? /110

马裕藻与 1934 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一 元勋还是罪魁 /118

二 解聘与辞职 /124

三 师、生、校异趣 /133

四 挽留背后的矛盾 /145

五 消沉与发奋 /154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一 北将入主南营 /164

二 南北新旧 /171

三 由分而合归本原 /179

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

一 留欧前后的转变 /194

二 顿悟：环境与交友 /210

三 敬而不畏之畏 /222

四 心照不宣的礼让 /232

陈寅恪的西学

一 学问难以贯通中西 /245

二 中国的东方学首席 /254

三 国人之中 西学较优 /263

四 取珠还椟 /269

五 申论 /275

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一 宋代为中国学术文化高峰 /280

二 “宋学” 渊源 /289

三 新宋学及其取径 /301

四 南北宋的高下 /313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一 取西洋哲学观念 /322

二 了解之同情 /329

三 宋贤治史之法 /335

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

一 思想为语言所支配 /341

二 求其是与求其古 /349

三 方法为仪型 结论不成立 /355

人名索引 /365

征引文献 /373

目 录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005

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一 圣道与技艺 /032

二 分途未必并重 /038

三 西体双轨 /044

四 分途与合流 /050

“中国哲学”探源

一 “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 /058

二 泰西哲学与中学 /068

三 “中国哲学”的取向 /076

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一 废除汉字：近代汉语言文字改革的目标 /088

二 我手写我口：白话文的过渡使命 /096

三 文言白话 孰为正宗 /104

四 龙种? 跳蚤? /110

马裕藻与 1934 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一 元勋还是罪魁 /118

二 解聘与辞职 /124

三 师、生、校异趣 /133

四 挽留背后的矛盾 /145

五 消沉与发奋 /154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一 北将入主南营 /164

二 南北新旧 /171

三 由分而合归本原 /179

留欧前后傅斯年学术观念的变化及其牵连

一 留欧前后的转变 /194

二 顿悟：环境与交友 /210

三 敬而不畏之畏 /222

四 心照不宣的礼让 /232

陈寅恪的西学

一 学问难以贯通中西 /245

二 中国的东方学首席 /254

三 国人之中 西学较优 /263

四 取珠还椟 /269

五 申论 /275

民国学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纠结

一 宋代为中国学术文化高峰 /280

二 “宋学” 渊源 /289

三 新宋学及其取径 /301

四 南北宋的高下 /313

“了解之同情” 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一 取西洋哲学观念 /322

二 了解之同情 /329

三 宋贤治史之法 /335

求其是与求其古：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方法启示

一 思想为语言所支配 /341

二 求其是与求其古 /349

三 方法为仪型 结论不成立 /355

人名索引 /365

征引文献 /373

绪论：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人生苦短，转眼已是耳顺之年。虽然按照如今的算法，仍在壮岁，毕竟不如少年时来日方长的无忧无虑，却一如既往地满怀学术的热情与向往。记得读博期间，业师年满花甲，在弟子的眼里心中，已是纯然长者风采。如今在门下士看来，自己的形象或许亦相仿佛，只是内心浑然不觉老之将至。

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昙花一现者多，几度辉煌者鲜。中国不仅历史长，而且文化一脉相承，所以史料甚多，史学较精，在中国治史尤其是治中国史，是对学人的一大考验，同时也是一大幸事。

屈指算来，尚待完成的计划为数甚多，在编拟编的大型资料和编年系列各有十数，在写拟写的专书还有数十，而且常常触类旁通，生发出许多预想以外的新枝。如果不从现在起就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势必抱憾终身。学问始终是令人遗憾的事业，尤其是史学，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等到功力见识皆备之时，已是去日苦多，时光不再。治学总体上说当然是层垒叠加，后来居上，可是长江后

浪推前浪的喧嚣声中，不知有多少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才人的远见卓识被时光埋没。

缩短战线，并非如陈垣所说，减少时段与方面；而是如陈寅恪所为，不与人无谓争论，减少应酬，不好为人师，不争闲气。概言之，舍弃俗物牵挂，全力以赴，潜心著述，以待来者。顾颉刚少年成名后曾经慨叹，出名前穷死，出名后忙死。前者如今已经不成问题，后者却是扼杀无数才俊的陷阱，与鲁迅说的捧杀有几分近似。广州僻处岭南，应酬有限；极少担任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免去劳而无功的审议和光怪陆离的人情；遵循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无须江湖，不必乡愿。除了气候不宜居之外，正是孤往治学的理想所在。加以学问的兴趣广泛，空间足够，可以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所谓真理不辩不明越辩越明之说，在抽象思维领域作用不小，而在史学研究领域，至少就近代以来的实际进程看，历次论战所导致的著述井喷，固然在引起广泛关注方面颇具影响，可是对于学术的实际推进，不仅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适得其反。网络时代，读书治学，更要注重孤往，因为坐拥书城，绝非难事，即使归隐林泉，只要能够上网，与身居闹市相比，也不过少了喧嚣和嘈杂，反而有助于专心致志。而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潜心读书更加重要，单凭检索关键词做出来的学问，只能是浅薄的时髦。

命运因缘，冥冥之中一线相牵。少年时到过的桂林良丰雁山公园，不仅曾经做过清季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园子，还与不少民国学界胜流有缘。1932年，广西省政府在此创办广西师范专科学校。1935年1月，胡适南下，曾到此一游，还以附近有相思江、岩边有相思红豆树，为园中的岩洞取名“相思洞”。后来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1942年，陈寅恪一家在热心之士的帮助下，从沦陷的香港脱险。因为担忧身体无法适应西南大后方的环境，陈寅恪滞留桂林，便在广西大学临时任教，因此与从来礼让的傅斯年就去留问题发生分歧，产生隔阂，埋下不愿远走海峡彼岸的心理伏线。

小时候居住的奇峰镇，与良丰墟由相思江一水相连。只是当时全然不知这许多故事，如今也不必自续出来一段前缘。同一条江流淌着不一样的水，就好像民国学界的取向与风气不仅五花八门，而且随时流转。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自信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而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或许还相当隔膜，因而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难以恰如其分。时下每每听闻标举称引民国学人及学术不能得当，心中总感到几分异样。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人赵翼的名句不仅能够说诗，也可以转而论学。只是意思有二解，按照本意即不断推陈出新，不必固守模仿。可是，如果每一代都是才人辈出，又都能够各领风骚，则一时代必同时有无数各领风骚之人竞妖娆。各代之间，也就无所谓高下之分。另一转意，虽然历代均有才人，却只有少数能够各领风骚，而且并非每代皆有，所以数百年间只能由不世出的高人所笼罩和覆盖。如此一来，历代学术发展的峰值高下不同，每一代的高峰跌宕起伏，后代未必高于前代。能够登顶一览众山小的，寥寥数代区区数人而已。在那些相对低洼的时代，有心向学之士不得不对着逝去的古人高山仰止，望着无尽的来者徒叹奈何。

平心而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除了当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风潮。^[1]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

[1] 民国时期此起彼伏的大学风潮，学界曾经着重从学生运动的角度加以解读，实则原因甚多，不可一概而论。近年来，循着大学与近代中国的取径，对于大学风潮以及背后所反映的大学内外各方关系的研究，受到重视。略显偏颇的，则是大学的学人与学术，未能纳入叙述的架构。无论如何，大学为教育学术机构，学风与世风相互激荡，大学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关怀，或多或少可见学人的学术及风尚的影子。

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三者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教授控制学生，防止师生联合对付校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也不会留下骂名。这点秘诀，说到底不过校园政治的权谋而已。清华大学以“神仙、老虎、狗”来形容该校教授、学生、职员关系的经典表述，也很难复制。况且，海峡对岸的清华还出现望文生义的曲解，误以为有辱办事员的人格。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在“某籍某系”^[1]的协助下，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也为大学与当局的冲突不断添加助力。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配合国民政府的集权统一，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与现在颇有些滑稽的去行政化背道而驰，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如果以水平线以上的成果进行比照，得出普遍不如现在的结论也不算过分。

不过，民国学人仍然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遑论超越。况且当时的乱象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混饭吃的手段伎俩，在坊间或有盲从，在学界却口碑不佳、风评甚恶，连官场也未必以为然。那时学界对于高明还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也有一旦下海无法从良的戒惧，除了无知无畏和有意出位，一般不敢恣意妄为，否则很难在学术界容身立足。

[1]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除了浙江大学竺可桢等个别例外，论专业造诣大都不在一流甚至不入流，大学行政也似乎不以专业优长为取向。因此，也就不会自居于学术领导者的地位，想出花样繁多的种种创新奇招，只是提供服务而已。

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正所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何须勤拂拭，不使有尘埃”。

本来学问只是少数有志者的兴趣，如果广泛参与，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些所谓方法范式能够流行，显然不是因为高明，而是简单易学，以致众从。说到底，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有需求者提供方便。民国时期，那些面向青年和大众的学问，还有鼓动思潮的作用。当年胡适许愿中学生也可以整理国故，未必是存心蒙人，而是史无前例，又多少有几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唱了些等而下之的高调，贻笑大方。所以，要追仿古今中外的贤哲，必须心向极高处，而不以时流为准的。

二

认识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一环，是了解把握学人之间言行的关联性。关于此节，坊间学界有无数的困惑，各种认识和说法彼此相歧相异甚至相反。就作品与作者而言，钱锺书说过吃蛋不必看鸡，所论是文学，而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就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作者的原意，由读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进行二度解读。就原典与注疏而论，章太炎主张“凡书皆需看白文无注之本”，钱玄同开始不以为然，

后来醒悟，知道“经义贵就白文细玩，注疏虽有时足供参考，然若字字点看，则徒乱人意，如章太炎师之于《说文》、廖季平先生之于群经、诸子，其所发明之精义皆由涵泳白文而得，全不似吴学末流、书院课艺之专务盘旋于许、郑、段、王之胯下也。……中国学问皆出于经，经义不明，则神州哲学无从讲求，而汉、唐、宋世之前注，则发明经义者少，胡说乱道者多。不究白文，无从治经也”^[1]。

受误解类似说法的影响，或以为研究学术，应直面文本，不必纠缠于学者本人的生平活动及其交游等，甚至不必追究与同时代其他相关文本史事的具体联系。可是，一味望文生义，就难免穿凿附会，如果研究者对于这些活动、交游和联系洞悉于心，解读文本时则会成为涵泳白文的重要凭借。这样的看法原以为仅适用于思维具体的中国，而近年的研究显示，一生活活动范围不超出居处一百公里的康德，其著作也是在与前贤乃至时流对话，思想并非仅仅活跃于抽象的逻辑世界。此说若属实，则比较参证的适用范围还会扩大。

既然表达思维的著述不是作者的自言自语，影响其思维和表述的时空人事等等因素就理所应当成为帮助解读文本的重要参照。历史研究的六个W，即What、When、Where、Who、Which、Why，不仅同样适用于思想学术史，而且更加重要。杨树达解经，须以相关事实和其他典籍相互参证，才能明圣人之言行；欧阳渐治内典，也要由俱舍宗而俱舍学，否则难以领悟教义。他们都是高人，且是行家，尚且无法直面文本通晓本义，其余一般所谓研治思想学术史者，若是盲目自信，就有妄自尊大之嫌了。多数直面文本的解读，不是断章取义的妄解，就是生搬硬套的附会，所说于本意相去甚远，于前人相当隔膜。说是叙述历史，实则吐露心迹，外行看了觉得热闹，行家看来，不过横通之论而已。

记录学人言行的，除了直接材料外，还有间接材料，即使从类

[1]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4—315页。

型上被归为直接材料的，如日记、书信、档案等，也包含大量间接性的记述，未必都能作为直接证据。而作为证据时，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应当比勘互证，不能轻易取舍。将有此说当作唯有此说，就会偏信则暗。以个人的经验，但凡并非真由本人署名的文字，网上不必论，辗转传闻而来的或道听途说，或穿凿附会，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由发布者自造，连个人的博客也是他人代为制作的，与本人毫无关系。媒体公开报道的文字，也很少属实。如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某著名报系所载在下的言论，或无中生有，或颠倒黑白，或背信弃义，无一为本人旨意。若是失察，引入正式论文，难免有轻信媒体可以守住道德底线之嫌。尽管今日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普遍而言或许尚不及以前，可是近代中国自有报刊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舆论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及分别，早已是治史取材验证必须讲究的重要环节。凡事不经验证，很容易上当受骗。

学人言行的关联性如何认定，更是一大难题。近代以来，虽然引入西式的学术批评，学人可以指名道姓地点评人物著述，可是好用此法者多为后进新锐，高明者一般不愿公开臧否人物及其文字。1922年3月，梁启超到北京大学演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不愧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竟然认为梁此举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除了在日记书信等私密文字中的坦白以及私下言谈的直率之外，学人公开发表的文字里更多的是古典今典之类的隐喻曲笔甚至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如果不能解今典通语境，虚实互证，一味望文生义地猜来猜去，很容易流于牵强附会。

同样以在下的经验，坊间学界关于本人著述的解读，除了别有用心的诛心之论，大都难免凿空逞臆，自以为是。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却硬指为“我说”、“我认为”的意思，其实多是解读者“他说”、“他认为”的想当然耳，与鄙意相去甚远乃至截然相反。或者对号入座，未免自视过高，其实未必入得他人法眼。而学术对话的言说对象，除了古今中外的贤哲大家，应是所研究的问题。即便公